

近年,有关民族主义史观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教育之弊端问题引起了学界的争论。因此,学者们开始摸索如何从地域史研究这一角度重新解读历史问题。换句话讲,在探讨国史问题时首先把拥有共同文化特色的地域作为一个研究范围,旨在通过对地域史的把握发现鲜为人知的史实。

东亚是地域史研究的主要范畴之一。包括蒙古、中国、位于朝鲜半岛的韩国和朝鲜、日本等国。这一地域,正如汉字文化圈这一概念所示,除蒙古之外的国家始终是由海路连接为一体的,相互之间有着数千年的文化交流,并拥有文化共同性的地域。另一方面,从13世纪至14世纪后半叶,上述大半地域也曾是由蒙古人进行政治统合的地区。这一时期东亚文化圈的文化交流异常活跃,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13世纪初,因高丽约定向蒙古进贡,蒙古使臣开始频繁往返高丽,且蒙古方面索取额外贡物之事时有发生。这便是高丽与蒙古最初的接触。例如,自1221年后每年往返于两者之间的著古与便是代表人物之一。1231年,著古与收取贡物返程时在鸭绿江畔死去。此时在蒙古,窝阔台已继承了成吉思汗汗位,成为了大蒙古国君主。窝阔台汗因著古与之死追责于高丽,曾先后6次派遣蒙军,直至1259年高丽全面降服。

不久,济州开始与蒙古接触。济州岛古代建有名为“耽罗国”的独立王国,后被高丽合并。济州位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无论主动与否,在地政学上处于与周边地域可进行广泛交流之处。与此同时,也较易被周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所左右。

至今为止,一般认为济州与蒙古的关系是以对立与纠纷为主,因此有过小评价蒙古对济州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之嫌。之所以出现上述观点,华夷论的影响不容忽视。在大蒙古帝国退回蒙古高原后,具有民族主义史观的一些学者认为汉族是中国的正统统治者,其他民族为夷狄。但最近出现了“换一个角度,即不以国家、民族的视角,而是从济州的对外关系与济州人的生活、文化这一角度进行考察时,会发现济州与蒙古最初的交流对于济州地域特性的形成影响及其深远,至今仍有案例可寻”等提案。例如,当时曾在济州养殖蒙古马,并曾经营国营牧场。现在,被韩国举国列为重点保护品种的“济州马”实为济州本土品种“果下马”与从北方输入的外来品种“胡马”的混血,在大蒙古国统治时期,又与蒙古马或西域马等多次混血的后代。

1265年,忽必烈汗从高丽人处闻知日本曾向中国派遣使臣通好一事,翌年便遣使携书2封前往高丽元宗处。1封书简记内容旨在欲与“日本国王”通好,1封书简命元宗派人护送该使臣前往日本。日本方面则无视忽必烈汗前后数次通好要求,以此为由,忽必烈汗开始着手部署远征日本,日本史称其为元寇或蒙古袭来。

2017年8月7日-9日,4国历史学家相聚北九州,就有关史学研究者如何在东亚“历史和解”问题上有所作为为中心内容召开了“第2届日本、中国、韩国国史学者对话的可能性:蒙古袭来与13世纪蒙古帝国的国际化问题”会议。从东亚的角度来看,蒙古对高丽、日本的侵略在文化层次唤起了各国的自我认识,在政治方面则象征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瓦解。本次会议,大家都热切期待可从“国史”与东亚国际关系切点处入手,进行多视界多角度的历史考察。

会议第二天,主办方组织与会学者前往“蒙古袭来”遗址,参观了元寇史料馆、箱崎宫、松原元寇堡垒遗迹等。在此,NPO法人志贺岛历史研究会的冈本颯实先生及管崎宫司田村克喜先生做了极具启迪性的讲解。如在箱崎宫的楼门上揭“敌国降伏”匾额,其意一般会被理解为希望进犯而来敌国被我降伏。但据田村先生讲,该匾额上书四字意为敌国被对方之德所折服,进而自行依从,即“以德服人”之意。

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国历史与他国历史之间的关系，首先应做到了解地域史，并在此基础上为拥有不同观点的学者们创造对话的机会与平台，以便不断深化人类共知的空间。

<娜荷芽（ナヒヤ）Naheya>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历史学系副教授。专攻东亚近现代史、蒙古史。201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武藏大学、和光大学。主要研究成果有“近代内蒙古文化教育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满洲国’时期蒙古人的中等教育：以兴安学院为例”（《日本蒙古学会纪要》第42号，2012年，3-21页）；“1930-1940年代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人的文教活动”（《日本とモンゴル》第49卷第2号（总130号），2015年3月，108-119页）等。